



詹鎔 先生八十华诞 纪念文集

河北大学中文系、古籍所 编

河北大学出版社

1321
12.

詹鍈先生八十华诞纪念文集

河北大学中文系、古籍所 编

河北大学出版社

特邀编辑:葛景春

责任编辑:任文京

封面设计:张志伟

责任校对:李金善

杨金花

责任印制:闻利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詹锳先生八十华诞纪念文集/河北大学中文系、古籍所编.

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1998.12

ISBN 7-81028-479-7

I.詹… II.河… III.詹锳-纪念文集 IV.K825.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38744 号

出版:河北大学出版社(保定市合作路 1 号)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制:河北新华印刷一厂

规格:1/32(850mm×1168mm)

印张:9.125

字数:210 千字

印数:1—2000 册

版次:1998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1998 年 12 月第 1 次

定价:12.00 元

前 言

今年6月29日，是詹镓先生的八十华诞。在这个值得庆贺的日子里，河北大学的领导、天津市出版局的领导、百花文艺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同志、詹先生的亲朋好友及门生弟子，会于一堂，举行了一个小型的庆祝会。会上，大家对詹先生八十年来走过的人生历程和六十年来的科研和教学生涯，作了回顾，对他所取得的辉煌成就进行了热烈的祝贺，并衷心地祝他老人家健康长寿。

詹镓先生1916年生于山东聊城，自幼接受传统文化教育，从小就树立了济世报国的宏愿。在他上高中时，正赶上了九一八事变，出于爱国热情，他与同学们一道从济南到南京，参加了向南京政府请愿要求抗日的政治活动。在北京大学上学时，北京发生了“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詹先生也与热血青年们一道上街示威游行。北京沦陷以后，北大南迁昆明，与清华、南开组成西南联大，詹先生在国难当头之际，深感学习机会来之不易，决心发愤读书，艰苦求学，以知识报国。詹先生眼界开阔，学习兴趣极为广泛。在学校，他所选的课程范围涉及颇广，因此遍受名师闻一多、陈寅恪、钱穆、朱自清、梁实秋、冯友兰、余嘉锡、罗常培、郑天挺等人的指导，在目录学、中国古典文学、外国文学、音

韵学、史学和哲学等多种学科都下过功夫，为后来的治学打下了宽厚坚实的基础。他大学毕业后，先后在西南联大、浙江大学、安徽大学和山东师范学院任教，深感同行和自己思想陈旧，见识不广，于是决定出国留学深造。1948年他毅然辞去教授之职，到美国留学。他先后在南加州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心理学，前后获得了硕士和博士学位。学成之后，他急于回国用自己的知识报效祖国。1953年，他冲破了美国的重重阻挠，又毅然地回到祖国的怀抱中来，被分到天津师范学院（河北大学前身）教书。先在教育系教心理学，后在中文系教古典文学。詹先生一面教书育人，一边搞科研。由于他受过多方面的训练和多学科的学习，因此文史兼通，学贯中西，既功力深厚又知识广阔，再加上他的勤奋和刻苦，他先后出版和发表了许多著作和论文，主要集中在中国古代文学和文艺理论方面。尤其是在“李白研究”和“文心雕龙研究”的研究领域中，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早在北大和西南联大学习时期，詹先生就致力于李白研究。曾在当时的各种报刊杂志上发表了许多研究李白的论文。他的《李白诗文系年》的稿子就写于昆明躲避日寇飞机空袭的警报中。但直到1958年，此书才与他另一部李白研究著作《李白诗论丛》在作家出版社出版。此二书奠定了新中国李白研究的基础，一直被学术界认做是李白研究的奠基之作和权威著作。近年来他所主持和主编的国家古籍整理重点项目《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八册，1996年12月已由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这部三百四十余万字的巨帙，更是一部规模宏大、资料宏富、二十世纪李白研究里程碑式的集大成著作。在《文心雕龙》研究方面，詹先生先后出版了《刘勰

与《〈文心雕龙〉》(中华书局1980年出版)、《〈文心雕龙〉的风格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出版)、《〈文心雕龙〉义证》(三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出版)。《〈文心雕龙〉的风格学》一书,是用中西文艺理论对比和多学科交融的方法,来研究《文心雕龙》的风格学的。其特点是学贯中西,思虑缜密,是一部颇开人眼界和启人思路的理论著作。而《〈文心雕龙〉义证》一书,却是以巨细不遗、包罗宏富、资料全面著称,是继范文澜《〈文心雕龙〉注》、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拾遗》之后的最为系统全面的研究《文心雕龙》的集大成之作。《〈文心雕龙〉的风格学》曾获得河北省第一届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著作一等奖。《〈文心雕龙〉义证》曾获得河北省第三届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著作一等奖,还荣获1992年上海出版新书优秀著作一等奖和国务院古籍整理小组评选的全国古籍整理优秀著作一等奖。总之,这些著作不但频频获奖,而且一直受到学术界的一致好评。这说明,詹先生在唐诗研究和文艺理论研究领域中所取得的卓越成就和学术地位已被学术界和社会广泛地承认与尊重。

同时,詹先生在培养人才方面也成绩卓著。从1938年在高校任职以来至目前,他为国家培养了大量人才,特别是从1980年以来,他还培养了一批硕士、博士研究生,这些人已先后在全国各地的高校和科研机构中担任学校领导职务和学科的学术带头人,他们在科研和教育战线上,正在发挥着其领导骨干作用。为了表彰詹先生在教育上的突出贡献,1989年,河北大学和河北省教委分别给他颁发了校级教学优秀成果奖和省级高校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1991年被国家教委评为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并授予人民教师奖章。

詹镡先生不仅在传授知识方面是我们的良师，更重要的是，在做人和做学问方面也给我们做出了良好的榜样。他一心报国的爱国主义情操和严格认真、科学严谨的学风，是给予我们受益终生的精神食粮。他不仅自己身体力行，而且对我们学生也反复谆谆教导。如在研究和讲述古代作家的思想时，他特别重视他们的爱国情操。他对李白和杜甫的爱国主义精神特别敬佩。在《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中，他特别写了《李白诗歌中的爱国情操》一文作为该书的前言。由此可见爱国主义精神在詹先生心中的崇高地位，这也是詹先生所给予我们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在科研方面，他一向是以严谨认真著称的。不仅他自己的学术著作学风严谨，一丝不苟，无征不信，不放空言，而且对学生也是这样严格要求的。他说过：文学虽然不是科学，可是文学研究则是一门严谨的科学，来不得半点粗心和马虎的。他科学严谨的学风，一直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在这方面我们都深受其惠，得益非浅。更值得我们学习的是詹先生对学术事业的献身精神。他平生没有什么其他爱好，唯一的嗜好就是读书和著述。除了吃饭和教学，他数十年如一日，从早上六点一直到晚上十一点，都是在伏案工作，即使在春节和节假日也是如此，没有一天中断过。即使是在住院时，也常常是在病床上手不释卷。他的工作精神，使医院的医生和护士也为之感动。此外，詹先生为人特别谦虚。他平等待人，从善如流，虚怀若谷，在晚辈面前，从不以长者自居，摆师长的架子。在学术方面，他一向是主张人人平等的，并且鼓励年轻人大胆独立思考，敢于发表自己的学术见解，哪怕是这些意见和自己相左。这种宽容大度的学者风度，常常使学生解放思想，大胆

放言，脱颖而出。

总之，詹先生在学术和教育方面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在这里仅是略举一二。他的学术事业和为学术事业献身的精神将由我们继承和发扬，为了纪念詹先生的八十华诞和六十年来来的教学业绩，我们这些詹门弟子各以自己学术论文呈献给敬爱的老师，以表达我们不忘师恩、继承师志的决心和感激之情。最后我们以在詹先生的八十寿辰时献给恩师的一首小诗来再一次表达我们对老师的衷心感戴：

杏坛执鞭秋复春，满园桃李已成荫。

纵然摘得仙桃献，难报吾师雨露恩。

编者

1996年12月

自 传

詹 镓

我 1916 年 5 月出生在山东省聊城县城内一个商人家庭。不到五岁，家里就送我上私塾，开始读什么《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弟子规》等等，光背不讲。以后才学习《四书》、《诗经》、《左传》，逐步开讲，又念《唐宋八大家古文》、《古文释义》以及策、论、议，甚至八股文。从十岁起，开始学作文言文，并学着对对子，准备作诗。这样上了七年半，整个童年时代都埋在书房里，不会打球，不会作操，也没有什么游戏和娱乐活动。趁晚上的时间，还要念《三国演义》、《精忠说岳》等给祖母听，使我在十来岁就成了一个小大人。“詹镓”这个名字，以及别号“振文”，都是家里人给我起的，可是“振文”这个别号，我在写文章时从来不用。

我没有上过小学，十二岁那年以同等学力考进初中。在初中时代，很快就把数学赶上去，其他功课也不落后，可是总因为有了文言的基础，在语文方面占优势。

上济南高中的那一年，发生九一八事变，我参加了 1931 年冬天北方学生南京请愿，亲自听过蒋介石欺骗请愿学生的鬼话。我们这些学生感到受骗之后，改成示威团，砸了伪外交部，我又亲自看见请愿学生受到国民党宪兵的迫

害。这是我第一次接触政治运动。

我的高中校长就是曾在山东曲阜师范学校上演《子见南子》而被革去校长职务的宋还吾。他爱好文学，请了一些青年进步文人做国文教师，其中有王冶秋、李俊民、董秋芳、陈翔鹤等等，我就是先后由董秋芳、李俊民老师教出来的。我在高中阶段，数、理、化成绩也比较突出，但是因为缺乏运动，身体越来越坏。考大学时，报了那时认为比较“省力”的文科，现在看来，这种认识显然是错误的。

我上北京大学，第一年在历史系，二年级转入中文系。从第一学年，我听赵万里先生讲史料目录学，就开始在工具书方面打基础。以后在中文系又跟着余嘉锡先生学目录学，跟着郑天挺先生学校勘学，初步懂得读古书时要注意版本校勘。我还跟钱穆先生学过中国通史和先秦史。

在北京大学上学时，看到朱光潜先生精通中外文学，我也注意学习外国文学。我旁听过英国小说、莎士比亚等英语专业的课，还连续学了三年法语。我又跟从罗常培先生学习语音学、中国音韵学，并在罗先生指导下翻译了法国汉学家马伯乐（Maspéro）写的《唐代长安方言》下半部。

至于教我古典文学的教师，在北京主要有胡适、罗庸、闻一多（当时他在北大兼课）。到四年级时，抗日战争爆发，我到长沙临时大学，在南岳衡山分校继续学习。1938年春，长沙临时大学西迁云南，改名西南联合大学，我又跟着到云南蒙自分校上课，这时期又听了原清华大学教授陈寅恪、刘文典、朱自清、冯友兰诸先生的课。回忆大学四年，是受了不少名师指教的，而我学的课程却比较杂，古典文学方面的，语言学方面的，历史学方面的，中国的、外国的都有。

但是我并不崇拜名教授，像周作人那样的“名流”，就从来不曾曾在课堂上传授过什么学问。

我在大学二年级时，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结识了一些进步同学，但是由于我沉浸在书本之中，没有继续加入革命的行列。在抗日战争时期，也没有对抗战直接作出什么贡献。

我西南联合大学毕业后，就到昆明任昆华女子师范学校国文教员。1940年初我回到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任助教，教“大一国文”。这时课余之暇，才开始研究李白，那主要是在罗庸先生指导下进行，有时也向闻一多先生请教。那年日本飞机经常轰炸昆明，我曾经抱着闻一多先生的《唐诗大系》手稿跑过警报。但是闻先生从来不跑警报，他怕跑警报耽误时间，在自己的院子里挖个防空洞，日本飞机来时，下防空洞躲一躲就算了。这种精神，我当时就觉得望尘莫及。

1940年底，我经友人介绍，到迁往贵州的浙江大学去任讲师。记得我到遵义的时间正是阴历除夕。第二天正月初一的早晨，我去看中文系主任郭斌和先生，才知道他是归国留学生，教欧洲文学的。郭先生要带我去看校长竺可桢。我说大年初一早上，恐怕他不会上班。郭先生说：别人不上班，竺校长可能上班。到了校长办公室，果然，只有竺校长一个人在那里办公。这给我一个终身难忘的印象。我从这以后五十多年来，无论寒暑假或节假日总是照常工作，没有额外的事从不休息，不能不说是受了竺可桢先生的影响。而竺先生以一位大学校长，居然接见我这样一个初出茅庐的青年，也是我后来的经验中少有的。

当时我才二十四五岁，以这样浅的资历作了名牌大学的

讲师，引起一部分浙江大学同事的不满。他们联合起来，去见竺校长，要求把我解聘。竺校长的答复是：只要发现我不称职，抓到我的把柄，浙江大学就把我解职。这时浙江大学的文科是反对白话文的，学校规定全校的“大一国文”都要讲文言文，学生作文也必须用文言，否则教师不给批改。我在当时为了能在浙江大学立足，才开始用文言来写有关李白方面的文章，接着编写《李白诗文系年》。后来收集在《李白诗论丛》中的文章，大多数曾在抗战期间西南数省的各种文史类刊物上发表过。此外，我还在《东方杂志》上发表过《曹植〈洛神赋〉本事说》、《〈玉台新咏〉三论》等。

1943年夏天，我辞去浙江大学职务，到四川江津白沙的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国文系任副教授。在女师学院我开了多种专业课，计有中国文学史、文学批评、中学国文教材教法研究以及《诗经》、《昭明文选》、《文心雕龙》等专题课。在此期间又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漫谈四声》、《改良国文教学制度刍议》以及翻译的小泉八云《论裸体诗》。我还写了一篇很长的专论《四声与五音》，发表在当时的女子师范学院《学术季刊》上。

我在大学中文系任教六七年后，感觉到古典文学教师中顽固不化的腐儒很多，而且门户之见很深，胸襟非常狭隘，这和他们知古而不知今、知中而不知外有关。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夏天，国民党教育部在国统区各地公开招考公费留学生，我在重庆参加了留学考试，报考法国文学。考试完毕，我顺江而下，到了南京，失业三个月，终于在安庆刚复员的安徽大学做了中文系教授。这年年底，国民党教育部通知我，把我改取为自费留学生，可买官价外汇，留学国别和

学习科目不限。我没有钱买外汇，听说到美国半工半读比较容易，于是决定到美国去学比较文学。

1947年，我因为中文系派别的排挤，被安徽大学解聘，转任山东师范学院教授兼国文系主任。这一年多，我除去应付上课之外，把主要精力用在学英语上，就没有再写文章了。到1948年5月，我终于得到购买船票和供应半年生活费用的外汇，8月初渡美留学。这在当时，一个中文系青年教授出国留学是不可想像的。

我在美国西岸登陆之后，首先在洛杉矶的南加州大学学比较文学。一个学期之后，南京解放，在国内购买外汇已不可能。我从第二学期起，一方面在南加州大学亚洲学系教一班汉语，一方面改学教育心理学。由于中学的数学基础较好，我在教育统计学方面取得了优秀的成绩。于是我改任教育统计学助教，给主讲教师改习题、看卷子，来维持生活。这期间我写出了英美人《如何学汉语》（“*How to Learn Chinese?*”）的专题手册，又写了阅读心理学方面的论文。1950年取得硕士学位。

1950年9月，我转学到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攻心理学。这个心理学系是当年美国教育心理学大师桑代克从事教学和科研的所在地。我到哥伦比亚大学的时候，桑代克（Thorndike）已经去世。我主要是从他的高足 Gates, Lorge 和桑代克的儿子小桑代克学习。另外，我还向 Ruth Strang 学习阅读心理学，向 Helen Walker 学习统计学，并取得美国统计学会会员资格。我到纽约后的生活费用，主要是靠在纽约亚洲学院（The Asia Institute）教汉语和中国文学课，我是这所专门院校的特约讲师。1953年，我在纽约市高等

教育局做过助理研究员。该局局长劝我申请永久居留，并进一步取得美国国籍。我拒绝了，我要回到祖国来。

我从小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书呆子。出国以前，我除去念书写文章以外，什么也不会。这样一个十足的中国书生，到美国去是很不能适应的。首先是吃不惯西餐，我不得不学着自己做中国饭菜。其次是不会跳舞，不会游泳，这在美国大学生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善意的外国女生教我跳舞，而我在这方面是想像不到的低能，出了许多洋相。我花了不少功夫学游泳，也只学会了个仰泳，蝶泳就学得很吃力了。在外国留学，特别是学心理学，如果完全割断了和外国社会的联系是学不好的。在我来说，是通过教汉语，当统计学助教，讲中国文学，到纽约市高等教育局工作，才和美国社会增加了交流的机会，英语才比较运用自如，也才能把心理学的书本知识和美国社会相印证，也才了解到美国人的长处和短处。

我在纽约学习的三年，正值抗美援朝时期。我曾在纽约一家进步影院看到上演国产彩色纪录片《锦绣河山》。当影片中映出毛泽东同志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布“伟大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我两眼流出了兴奋的热泪，我一定要回到祖国来。我虽然不是学国防科技的，可是心理学在美国认为属于自然科学，我申请回国时，美国移民局还是多方阻挠的。经过长达一年之久的反复申请和据理力争，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取得心理学博士学位后，还没有领到证书，就回祖国来了。

我回祖国，本来想利用在美国学的工业心理学、教育心理学以及计算机软件等来为社会主义祖国作贡献的。可是我

1953年回到国内，抗美援朝停战协定刚刚签字，我得不到信任。心理学研究所不接受我，当时国内也没有电子计算机，我等了半年多，到1954年3月才到天津师范学院（河北大学前身）任心理学副教授。

当时国内正号召全面学习苏联。我一到校工作，就马上加紧学习俄语，争取能读俄文的心理学书，并参加巴甫洛夫学习讨论会。在美国弄到的电子计算机操作书籍，就通过学校转赠给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了。到校四年，心理学教材共十四章，我写了十一章。没想到1958年康生亲自发动了对全国心理学的批判，我不可避免地成了天津师范学院被批判的重点。从此课停了，在天津总医院和第一中心医院设计的医学心理学实验也夭折了。可是我在出国以前写成的《李白诗论丛》和《李白诗文系年》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先后于1957年和1958年出版。我对心理学丧失了信心。

从1954年到1961年，我实际上共教了六年心理学，除编写教材外，还写了《巴甫洛夫心理学观点的历史探讨》（见《天津师范学院学报》，1956年）；《巴甫洛夫对心理活动和心理学的看法》（见《心理学报》2卷1期，1958年7月）；《从心理学的对象看心理学的科学性质》（见《心理学报》1961年第4期）。1957年我写过一篇《中学生的阅读兴趣调查》，没发表。另外，我还和其他同志合译了苏联鲁季克（Pyduk）著体育学院《心理学》教科书，1959年由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

1960年天津师范大学改名为河北大学。1961年，我由教育系调到中文系教古典文学，恢复了中文系教授的职称，以至于今。

在转入古典文学教研室以后，我写了《齐梁文艺批评中的风骨论》（见《光明日报》，1961年12月10日）；《谈杜甫的〈洗兵马〉》（见《光明日报》，1962年5月13日）；《从杜甫诗文中看他中年的思想发展过程》（《文史哲》1962年第9期）；《〈文心雕龙·明诗篇〉义证》（《河北大学学报》1962年第2期）。

1964年以后，全国文艺界掀起了批判运动，我就不写文章了。只是1963年我应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之约，编写了古典文学基本知识丛书之一的《唐诗》。这份稿子在1965年本来就要发排的，可是没有排出来。还有我应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之约，编写《〈文心雕龙〉义证》，除去其中的《明诗篇义证》之外，其他各篇，还没有动笔，就遇上“文化大革命”。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我首先被指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而受批判，继而被当做“牛鬼蛇神”而关入牛棚，家也抄了。所幸抄家的人手下留情，书籍很少抄去，稿件和资料也只没收一小部分，后来也大都补起来了。我从“牛棚”出来之后，两次参加“教育革命小分队”，两次下放劳动，业务大大地荒疏了。

“四人帮”被粉碎后，我的精神才逐渐地振奋起来。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改组为上海古籍出版社，他们通知我把已经退了稿的《唐诗》，再根据近年来的研究成果进行修改。该书于1979年出版。1977年底，我又应中华书局之约，编写中国文学史知识丛书之一《刘勰与〈文心雕龙〉》。这本小册子虽然通俗地介绍《文心雕龙》，却代表了我对《文心雕龙》的整个观点。该书已于1980年出版。

我认为《文心雕龙》一书最突出的贡献之一是它的风格

理论。从调到中文系以来，我陆续写了这方面的论文多篇，有些于1979年、1980年先后在各杂志上发表。我把已发表、将发表和未发表的这方面论文，编成一集，取名为《〈文心雕龙〉的风格学》，1982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此外，我还应上海古籍出版社之约，继续编写《〈文心雕龙〉义证》。这是因为“文化大革命”前后发表了不少研究《文心雕龙》的文章，其中对于一些问题的解说，往往各执一辞，有的甚至把自己的看法强加在刘勰身上，多空论而少实证。我写这部书稿的方法，是对《文心雕龙》各篇引用的出处和典故详细研究，以探索其中句义的来源。上自经、传、子、史，以至魏晋以来的文论，凡是有关的，大都详加搜考；其次是参照本书各篇，辗转互证；再其次是比附唐宋以来文评诗话，并比较论点的异同，以为参证之资。对于近人的解说，也择善而从。准备放在这部分前面的《〈文心雕龙〉版本叙录》，先在《中华文史论丛》1980年第三辑发表。希望继范文澜先生《〈文心雕龙〉注》之后，对《文心雕龙》中理论的阐述能呈现出一种新面貌。

1980年我带头招收了硕士研究生四名。

1981年秋，我参加了在武昌市召开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后被选为理事。是年底我被任命为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小组成员。1982年3月在京参加了第二届古籍整理规划会议（第一届成立于“文化大革命”前），始知该小组召集的有顾问和成员两类。顾问年纪更大，可以不报项目，成员则必须承担古籍整理项目。我在会上报了《李白全集》校注的项目。是年5月我到西安参加第一届唐代文学学会，我在会上报告了《李白全集》校注的规划草案。会上被选为唐